·经济研究新视野·

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的逻辑演进与现实借鉴

刘　斌　朱晓梅

［摘　要］　本文试图从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的逻辑演进中，探寻中国对外开放和全球治理的历史脉络和学理基础。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主要围绕“四个维度”展开，第一个维度是古代关于生产的经济思想，主要内容包括禀赋论、专业化生产与规模经济以及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第二个维度是古代关于交换的经济思想，主要内容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展开；第三个维度是古代关于运输的经济思想，主要内容包括国际贸易的陆路运输和海运通道；第四个维度是古代关于治理的经济思想，主要内容围绕义利观和天下观展开。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基本涵盖了西方国际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并基于中国历史现实，从政府作用和价值观维度赋予了国际经济理论更多意涵。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为中国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提供了历史镜鉴和理论支撑。

［关键词］　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24］03-0114-13

DOI:10.14112/j.cnki.37-1053/c.2024.03.016

一、引言

（一）思想的起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大命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千年历久弥新，尤其是古圣先哲开放型经济思想之灿烂较之西方不遑多让。中国古代即拥有完整的经济政策体系，几乎所有主要古代思想家的哲学著作中都论述了经济思想，这些以服务国家为本位，以“富国足民”为目标，管理国家资源、增加财政收入、改善社会福利的“经世之学”和“治国理财”等哲学思辨不仅是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世界的思想指导，也为西方经济学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先行思想要素支持。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即蕴藏其中，它是古代统治者和思想家关于国家开放与对外贸易的思想探索，既包含了西方国际经济学中重要的基本思想与核心观点，如要素禀赋与生产分工、国富与民富关系的“富国足民”说、国家干预市场的经济思想“轻重论”等；也有对经济基础与

作者简介：刘　斌，男，经济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朱晓梅（通讯作者），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贸易开放、国内运输成本与南北经济差距”（项目编号：72173020）、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全球经贸规则重构背景下的 WTO 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1JZD023）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我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进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BJL090）的阶段性成果。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上层建筑、全球治理观、大国竞争等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命题的深刻阐释，如“义利观”“天下观”等。自秦汉以来我国商品经济在曲折发展中快速繁荣，各朝代皆出现过工商业极盛的场景，却始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或殖民主义，对外开放中也没有奴隶贸易和血腥贸易，始终奉行平等友好的贸易原则。如今我国国际交往中的中国风格、对外开放的国际视野和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无不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尤其随着西方经济学愈加追求识别清晰的模型化、数理化，在面对泛政治化、“市场逻辑让位政治逻辑”的国际市场摩擦和大国关系问题愈加凸显时，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体现出的科学性与世界观不应明珠蒙尘。

（二）文献综述

关于中国古代开放型经济思想的研究屈指可数，郑学益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中国古代对外开放思想包含官方贸易与民间贸易两种不同的倾向，前者是古代统治者加强与管辖区域的联系和扩大内外声威的对外贸易思想，后者是广大人民要求开放、重视与各国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贸易思想①。此后，也偶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目标是华夷理念和朝贡体制下的“御夷狄”和“通财用”②。遗憾的是，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的研究尚未受到学界的重视，零星的开放型经济思想散见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相关的研究中。关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近年的研究不仅包括系统的经济学说和短暂占据过主流地位的某种经济思潮，而且更多的研究从西方经济学的术语和视角解剖我国古代社会经济现象，以此评价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并引以解释现代经济问题③。前一类文献挖掘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智慧之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主要有三类：一是经济哲学思想，二是见解、意见、主张等政策性思想，三是对经济现象和问题的分析和说明的理论。这三类思想往往联系在一起④，其中，国家本位、整体思维以及伦理导向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与此同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体系庞大且涉及广泛的经济议题，如首部论述农业商业周期波动的古代著作《计然子》⑤、从权力与伦理视角看待孔子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⑥、提出“轻重论”是古代政府干预商品经济的思想根源⑦以及中国古代早已有对资本正反作用的辩证认识⑧等。后一类文献主要强调古人思想“与西士所论有若合符”，且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先于西方数百年，对世界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⑨。此支文献既有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全局角度论述古代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学的融通之处⑩；也有从某个具体学说印证二者的相似性，如皮凯蒂理论与中国古代的抑兼并共同表达了抑制资本集中的思想⑪，“休养生息”和“兴修水利”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的典型需求管理政策，而“技术创新”则属于供给管理政策⑫，《管子》

①郑学益：《中国古代对外开放思想简论》，《江淮论坛》1989年第5期。

②黄纯艳：《新变与局限：宋代社会的开放度》，《人民论坛》2023年第2期。

③石世奇：《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当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郑学益：《思想制胜的新世纪营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刘方健等：《唐庆增的工商业发展思想》，《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④钟祥财：《〈管子·轻重〉经济思想研究述评》，《上海经济研究》2011年第10期。

⑤Milburn, Olivia, “The Book of the Young Master of Accountancy: An Ancient Chinese Economics Text,” in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50, No. 1(2007), pp.19-40.

⑥程霖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基本结构与内在逻辑——基于权力与伦理视角的孔子经济思想考察》，《财经研究》2019年第8期。

⑦宋娟：《“轻重论”：古代政府干预商品经济的思想根源》，《广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⑧张晓晶等：《中国古代社会的资本治理及其启示——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视域下的资本》，《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⑨赵春玲：《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当代经济研究》2022年第10期；程霖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第2期。

⑩周建波：《〈中庸〉、〈大学〉的经济思想暨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耦合》，《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第1期。

⑪舒丽娟等：《皮凯蒂理论与中国古代的抑兼并经济思想比较》，《上海经济研究》2017第4期。

⑫Wong, John, and L. F. Lye, “Reviving the Ancient Silk Road: China\"s New Diplomatic Initiative,” in *East Asian Policy*, Vol. 6, No. 3(2014), pp.5-15.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提出了相机抉择和刺激消费思想①。此外,认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先行思想因素也有诸多论证,《孔门理财学》充分证明了当西方世界对经济学只有零散认识的时候,中国古代早已有了相对系统和成熟的思想、管理、制度和体系②。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日本经营管理模式建构、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农业立法及宏观经济稳定等都起到了积极正面的借鉴作用③。

从以上文献梳理可知,中国古代经济思想遗产不可谓不丰富,但也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关于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的研究尚未起步,仅有的文章对于外贸易思想的论述较为笼统,实质为仅描述古代开放状况而对经济思想关注不够。第二,关于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范式过度依赖西方经济学的经济要素对其解剖,忽略了对中国古代经济活动所体现的经济思想的特点与逻辑的研究。尽管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在某个时期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很多理论并不能够解释中国现实,要解释中国现实需基于中国自身经验提炼出来的科学概念和理论④。如“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是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力,西方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对此没有进行充分的阐释,但“有为政府”思想在我国古代经济思想中已有诸多体现。第三,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对现当代经济问题以及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构建具有启示意义。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是我国当代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坐标⑤,但尚无文献对其进行系统梳理,古为今用并非口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融会贯通。本文专注于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并试图从这一思想的逻辑演进中,探寻中国推动对外开放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脉络和学理基础,对当前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现实借鉴,奠定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具体而言,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分为三类,以经济哲学思想和见解、意见、主张等政策性思想为主,并从生产、交换、运输与治理四个维度展开。国内生产的剩余与国家财政目标促使对国际市场开放从而进行商品交换,运输条件决定了交换的成本与安全,在此过程中古代思想家们在“富国足民”这一传统经济目标指导下发展的关于治理的经济思想指导生产、交换与运输中的经济社会问题,形成了完整的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体系。

二、古代关于生产的经济思想

两千年前的中国古代社会便有庞大的经济体系。客观来说,开放型经济思想的萌芽产生较早,历经列国经济、诸子百家与朝代更替,逐渐形成了对外贸易思想和经济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商鞅以及孔儒学派,汉代的司马迁,宋代的叶适,明代的张居正等。生产是贸易活动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关于生产的经济思想是古代开放型经济思想的底层建筑与逻辑基础,这一经济思想以服务国家为本位,管理生产活动与资源,服务封建统治者以达到社会发展、经济繁荣的目的,其经济思想主要包含两条支线:一是自然资源禀赋、专业化与规模化经济等关于生产的开放型经济思想,其理论成就虽未形成,但在古代社会是日用而不觉的;二是关于农业与工商业的争论,包含了古代统治者及思想家们大量的见解、意见、主张等政策性思想,以及少量对经济现象和问题的分析和说明。需要指出的是,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需辩证看待。一方面,古代思想家的开放型经济思想不乏为阶级利益服务的历史局限性,同一位思想家的经济思想前后也会出现矛盾,如管子经济思想既有鼓励贸易、轻征税收等积极的开放因子,又有盐铁专营、利出一孔等集权抑商思想;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

①张亚光:《中国古代经济周期理论及其政策启示》,《经济学动态》2011 年第 8 期。
②陈焕章:《孔门理财学》,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36 页。
③程霖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 第 2 期。
④田国强:《中国经济学思维方式与关键研究方法》,《探索与争鸣》2021 年第 8 期。
⑤裴长洪:《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经济研究》2022 年第 1 期。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济发展带来新的启示,人们对一个学派或思想家的经济思想往往会产生新剖析和新认知。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开放型经济思想的合理内核和积极要素值得传承、发展和提升①。

(一)资源禀赋、专业化与规模经济:对外贸易的开端

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为本,统治阶级及当时的先进分子指导人民各尽其能适合时令,因地制宜积极生产,“资源禀赋论”的经济直觉较早出现在思想家的经济意识与社会经验中。早在春秋时期,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思想第一人管仲即认识到自然资源禀赋对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性,提出“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劝其女工,极技巧,通渔盐”,发掘齐地(今山东)海盐生产与柞蚕养殖的优势。伴随着农业生产技术改进带来生产力明显提高,古代社会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专业化生产”与“规模经济”顺势产生,使工商业生产成本降低从而产生国内生产剩余,成为古代对外贸易的先决条件。《礼记·中庸》中即提倡“能则专”“专则佚”,鼓励人们钻研一门技术,“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荀子·劝学》)。农业部门出现了药户、漆户、果农、茶户、桑农等专业经营者,《周礼·考工记》中也详细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冶金业、纺织业、制车业、制陶业、制漆业等手工业部门中各个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作技艺。随着专业化生产与规模经济带来的效率提升与市场收益增加,这些经济思想在实践中广为应用,盐铁业、畜牧业、渔业、林业和园圃业等都出现了以营利为目的的大规模农场式经营。

简言之,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自然顺序首先是以农业为本,其次是城市工商业发展,最后是大宗手工业商品的规模效应推动对外贸易的进程。隋唐五代时期便有了专以外销为主的窑口,主要生产带有胡人乐舞、椰林、葡萄等具有浓郁西亚波斯风格题材贴花图案的瓷器。宋明时期以国际市场消费者喜好为指导,专门为国际贸易而规模化生产的丝绸、瓷器等手工业制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行销海外。在这一时期,古代各国依托自身自然资源禀赋和技术差异带来的绝对优势决定了贸易结构的国际分工也已出现。上好的香料产自东南亚,胡椒粉、棉织品以及珍珠、珊瑚和象牙来自印度,罗马帝国则以玻璃器皿、首饰、手工艺品、橄榄油、香水生产等见长。

(二)农业与工商业的争论:重农抑商与工商皆本

商品经济伴随着专业化、规模化生产而繁荣,资源有限与财富分配不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也随之出现,尤其以发展农业还是发展工商业的矛盾为首。是否发展工商业是古代封建社会经济体制的重大方向问题,不仅影响市场交换的商品种类,而且影响国际贸易的进程,在这一现实问题的激烈争论与经济实践中,经济思想在“重农”的基础上阶段性地出现了“抑商”“厚商”“工商皆本”等经济思潮②。经济思想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这一经济思想变化的根源在于农商关系的矛盾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效解决。在重农抑商占据主流的时代,社会资源有限,“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荀子·儒效篇》),且奢侈品(末业)的生产极消耗资源,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占用了发展农业的人力、金钱等资源从而妨碍农业生产,弃农经商之风盛行成为统治阶级忧虑的社会问题,因此以荀子的“富国论”为代表的法家学派和思想家们极力推崇“重农抑商禁末”的主张,并将其思想制度化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形成了一套具有时代特色的解决弃农就商问题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和体系③。这一经济干预政策离不开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农商关系,但也极大地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对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④。但随着生产能力提高、交通运输业发达、地区间经济联系加强、商品经济快速发展,较多的人口

①巫宝三:《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主要方面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②唐光斌等:《中国古代经济哲学思想之本末论》,《求索》2006年第12期。
③宋娟:《“重农抑商”——古代政府干预商品经济政策渊源》,《兰台世界》2014年第34期。
④齐秀生:《浅析中国古代的抑商政策》,《理论学刊》2004年第3期。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从农业部门中解放出来从事工商业活动,商人在市场的指引下将丰裕资源引向稀缺领域,实现了资源要素的最佳配置,资源有限、分配不均的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在这一经济活动中,传统观念发生变化,“抑商”的程度与政策出现差异和松动,“重农厚商”与“工商皆本”的新思想对传统“重农抑商”思想带来巨大挑战,也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一项重要遗产。

随着工商业在富国中的作用逐渐受到重视,中国古代历史上部分朝代的举措促进了重商思想的发展,形成了阶段性农商并重的经济结构事实,这一经济思想演变主要分为两个交错渐进的阶段。其一是部分思想家们肯定人民追逐财富的合理性,以及商人在社会分工中平等的职业地位以及工商业部门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如唐代白居易提出了职业平等观,提倡工商业也应获得正常的政治社会条件,认为“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策林》卷二)。宋代叶适也认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习学记言》卷十九)这些都是对工商业与农业关系进行重新认识而形成的经济思想。其二是以北宋时期思想家李覯为代表的部分思想家的视角更为先进,在主张农工商并重的同时,认识到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组成作用,社会出现新的经济因素。一是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早期工业化启动。一方面,李覯观察到官营盐铁中的严重积弊,官吏中饱私囊使得盐茶质次价高,滞销浪费严重且政府财政收入大为减少,由此主张由私人经营盐铁;另一方面,北宋首创在县以下的商业繁荣之地设立镇市,使镇由过去的军事设防之地变为商贾交易之所,大量的农业人口向城市或工业区转移,是中国古代商业领域的一次重大的革命性变化。二是随着国内外市场容量增大和经济开放度提高,海上外贸收入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元时代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等港口城市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地。为了使招商和征税更便利,部分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在港口城市担任海关要职,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外贸部门在元朝时期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

表1 古代重视工商业的经济思想梳理

思想家	主要思想主张	说明
西周时期思想家	无抑商思想,肯定农工商虞都是社会所必需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周书》
管仲、荀子	肯定除奢侈品生产以外的手工业和商业的社会作用	“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荀子》 “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子·小匡》
司马迁	主张农工商并重	“故待农而食之,虞(开发山泽资源)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记·货殖列传序》
桑弘羊	重视发展国有工商业	汉朝时期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
李覯	重视工商业并限制奢侈品生产	“农不可无手,手不可无商。”——《经世致用》
丘濬	反对侵犯商人和地主的利益	“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税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大学衍义补》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整理。

三、古代关于交换的经济思想

交换初始于资源禀赋与绝对优势、专业化与规模化生产以及生产率的提升,关于交换的经济思想多见于古代统治者的政令、开放政策以及国家间贸易盟约、通商条约等,因此多属于见解、意见、主张等政策性思想。中国古代社会交换的形式开始于夏商周时期的贩运贸易,兴起于汉唐陆路贸易,繁荣于宋元海上贸易。市场是交换的场所,也是国民财富增长极为基础且重要的环节①,国内市场的繁荣促进了国际市场的交换。在这一过程中,关于交换即贸易的经济思想逐渐完善。一方面,通过国内市

①宋纤:《“大国经济史:中国贸易规模和市场演变”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23年第5期。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场繁荣,古代统治者及思想家们逐步认识到国家调节经济的作用和尊重市场机制与积极调控市场的关系,蕴含着“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经济理论的先行要素;另一方面,随着国家逐步对外开放,古代思想家们的开放型经济思想经历了从认为对外贸易属于政治上扬威、外交上怀柔的手段,到逐渐认识到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转变。需要说明的是,纵观中国对外开放史,中国古代的对外开放呈现“曲折开放”的形态,即当聚焦中国古代社会封建割据、时战时和、较为封闭的具体时期时,由于“国防”重于通商使对外贸易受到诸多限制;当视角更为宏观纵观历史长河时,中国古代社会后期较早期的开放规模明显更大,开放政策逐渐系统化、制度化。如唐宋时期的经济运行更具活力,表现出较前代更大的包容开放气象,社会流动畅通,城市更加自由①,这些无疑是古代开放型经济历史的亮色。因此中国古代的对外开放并非随着时间推移呈现线性扩张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在曲折中开放。

(一)国内市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在秦汉时期,市场在数量和规模上已有了较大发展,从“通都大邑”(首都和大城市)到一般县城普遍建立起市场,且都有一定的规划布局和建筑设施。唐宋元明时期商业极为发达,凉州、洛阳、广州等地作为陆海丝绸之路上的大都市是重要的国内外商品集散中心,“大小铺席,连门俱是,无空虚之屋”,称得上是中国封建社会商业的成熟形态②。随着古代市场从野蛮发展到成熟阶段,古代思想家们的学说、理论、观点等丰富了当时的经济思想,尤其以经济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这两种关系国家基本政策的经济思想最受瞩目,这是古代政府逐渐重视市场监管与经济发展、摸索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平衡的经济思想萌芽。经济自由放任思想在中国古代无为而治的政治气候下流行一时,以司马迁和白居易为主要代表。早在亚当·斯密之前,司马迁就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隐含表达了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等价隐喻——“水之趋下”③。在此基础上,他的“善因论”承认民众的求富欲望,并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自有其内在动力。其中,“因”即顺其自然,提出国家政策要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减少人为强制干预④,但同时“善因论”认为,对于“善者”国家只要做好引导即可带来国富民强,该“因之”的时候就“因之”,该“通变”的时候就立即坚决“通变”,这说明司马迁也认识到政府利用经济杠杆进行干预的必要性⑤。白居易也有相似观点,他肯定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职能,但是反对超经济的行政力量扭曲本应由市场决定的社会各成员的收入分配,这可以从他批评盐法、和籴等政策的弊端中得到印证,如他主张“王者不殖货利”,“散盐铁之利,亦国足而人富安矣”(《策林·不夺民利》)归利于民。

古代以农为本的经济结构具有先天不稳定性,在商品经济作用下,荒年时百姓以高利贷度日,丰年时谷贱伤农,市场失灵时有发生。政府作为市场管理者和参与者干预和介入市场是必要的,国家干预的经济思想也由此产生,此类经济思想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监管与维护市场的经济思想,各朝代政府主要围绕市场组织、商品经营范围、行业进入许可等方面出台了诸多政令措施,目的是维护市场稳定和交易安全,这一国家干预经济思想与经济自由放任思想相辅相成⑥。在市场监管方面,市场的组织管理、市期、地址等从秦汉时期即有大致的规定⑦,市署设有各类吏员,负责物价管理、商品质量管理、度量衡管理以及市税管理和治安管理等。在商品经营范围方面,各朝代政府基

①黄纯艳:《新变与局限:宋代社会的开放度》,《人民论坛》2023年第2期。
②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1页。
③Leslie Young, “The Tao of Markets:Sima Qian and the Invisible Hand,” in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Vol.1, No.2(1996), pp.137-145.
④陈永庆:《论司马迁“善因论”思想及现实启示》,《陕西教育(高教版)》2012年第2期。
⑤陈旭东、田国强:《司马迁的因俗以治思想及其现实镜鉴》,《财经研究》2016年第7期。
⑥郭庠林:《试论中国古代的封建市场经济》,《财经研究》1998年第7期。
⑦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本采取“负面清单管理”措施,西周禁售体现贵族身份品级的礼器(圭璧金璋、宗庙之器、锦文珠玉成器)和祭祀用的“牺牲”等;汉朝以后铁制品、兵器等进入负面清单管理;宋朝时对珍贵的舶来品和香料等采取禁榷(由国家专买专卖),在“官市之余,听市于民”。在行业进入许可方面,战略物资的生产部门由官方经营的思想由来已久,盐铁业在历朝历代皆为官营,在汉朝时酿酒业也由官方经营。二是以管子的“轻重论”、汉朝的“均输平准”政策、范蠡的“平粜理论”为代表的平抑市场物价、调剂供求、调节重要物资(粮食)价格的经济思想。尽管在专制集权的古代社会中,这类政府调节市场的经济思想往往和国家获取财政利益的追求目的交叉在一起,但不可否认其对经济社会的积极影响。“轻重论”是管子经济学说的基石,是中国古代最早提出商品价值规律的经济思想。在《管子·轻重》中,“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的“轻重”被引申为物价的贵贱、商品和货币的比价关系,当货币交换商品的比例升高时,即出现“币重物轻”的现象,相反则是“币轻物重”。在此基础上,“轻重论”还讨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和具体政策措施,提出了“以轻重御天下”政策主张。除此之外,古代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促生内生动力,从而扩大消费增加就业的经济思想极为先进,在各个朝代广为应用且效果显著。其一是提出增加消费带动生产的经济思想。《管子·侈靡》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较早论述消费对生产促进作用的创见,记录了管仲的“奢简观”,即鼓励富人进行奢侈消费从而增加穷人谋生手段,“君臣之财不私藏,然则贫动肢而得食矣”。其二是指出在市场低迷时国家应增加政府购买支出的经济思想。北宋范仲淹、沈括等提出水旱灾荒之年应修建宫室台榭招收贫苦百姓做工,“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梦溪笔谈·官政一》)。

(二)国际市场: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

早在中国古代社会封建割据时期,当时的统治者及思想家便认识到市场的封闭狭隘和政治因素阻碍了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并试图建立区域性的经济盟约,具体内容包括有“毋忘宾旅”“毋塞利”等,以便利商旅往来、川泽开发、土特产品交流。古代中国市场在大多数朝代已相当开放,中外、民族间贸易具有客观基础与交换需求,“通关互市”是古代政府对国际贸易的官方认可。整体来看,古代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是一国或区域重要的对外经济政策,虽然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但中国始终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交流。

通过在国际市场上反复实践,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内涵逐渐丰富,对国际贸易的认识经历了从获取奇珍异宝到追求边境稳定和周边国家认同再到发展国民经济的过程。首先,秦汉及以前的思想家们多认为发展对外贸易是交易双方“以其所有,易其所鲜”的共同愿望和从外部获取财富的治国方针。春秋时期管仲提出“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汉朝时期桑弘羊提出“以末易其本,以虚荡(易)其实”,这些古典外贸理论是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的压舱石,一直被古代和现代的决策者应用于实践。其次,汉唐以来稳定国内经济、维系民族交流是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政治和经济功能。汉唐大部分时期对外采取怀柔绥抚政策,对周边民族开通关市、促进经济文化交流、满足其物质需要,更主要的目的是减轻边患问题,以维持良好的周边环境。茶马互市是两宋王朝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治边政策,维护了中央政府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对维持宋朝边疆安全与稳定起到重要作用。最后,宋明清时期的思想家们认为对外开放是增加财政收入、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一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非常具有创见,它与此时期因海外贸易发达而出现大量专供国外市场的手工制造业密切相关。更具体的经济政策包括卢世荣首创的公私合营的对外贸易经营模式——“官本船”贸易,即由国家出资造船,民间商人进行招商经营,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首创;还有“经济自贸区”的思想萌芽,由清前期思想家蓝鼎元提出,在海外贸易依存度较高的福建省建立有专门进行国际商品交易的市场。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随着国际贸易扩张,古代政府对国际贸易更加重视,为了有效规范和促进对外贸易,对开放政策、开放行业、开放地点等推出许多举措。在开放政策上,各朝针对本国及外来商人跨国经营都有许多优待措施和奖励。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针对外国商人提供经商便利、优化营商环境,“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并对齐国在外经营的商人采取专门的减税免税政策。为了推动贸易便利化,宋朝“茶马通道”上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元代的驿站制度发展到鼎盛时期,商人可将财物寄存在沿途旅馆或驿站,走时取回或可直接送往下一站,如有损失如数赔偿。在开放行业上,根据行业性质做到专管专营。兵器、铁制品、铁矿、硝磺、盔甲、弓箭等兵器或兵器原材料以及牲口(尤其是马匹)是各朝代关市的违禁品。而对于优势支柱产业,则推行更多优惠措施促进出口,如春秋时期齐国对鱼盐业不征税以促进对外贸易。在开放地点上,选择在哪些城市和港口“通关互市”需经过政府的批准。北魏政府在洛阳设有专门供西方商人开展贸易的场所——“四通市”,为外商的生活和商务活动提供便利,有力地促进了中外贸易的发展。唐朝的广州是对外开放的国际城市,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自由贸易港”,港口设置蕃场由专人管理。南宋时茶马互市的地点也固定在四川五场、甘肃三场等八个地方,分别与西南、西北少数民族交易。

表2　各朝代对外开放政策归纳

朝代	边境贸易政策	朝代	海上贸易政策
汉朝	在西域地区建立完备的军事行政管理机构“西域都护府”促进边境贸易	唐朝	建立蕃坊、蕃市、蕃学、蕃长优待外商
	公开招募使臣开展官方贸易活动,班超、甘英等出使西域诸国		在广州设立市舶使
魏晋南北朝	“四通市”专门供西方商人开展贸易	宋朝	主动遣使往东南亚招徕外商,立法保护外商在华财产
	实行过所制度,保护中外商人,敦促敦煌郡协助商人购买内地商品		颁布“元丰市舶法”,设立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司(市舶务、市舶场等)
隋朝	设立丝路贸易的主管官员		增设开放口岸,先后设置市舶机构的港口有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秀洲华亭、江阴、温州及澉浦9处
	张掖举办万国博览会,洛阳开办中外商品交易会,积极招徕外商	元朝	修订《市舶法则》,完善市舶机构
唐朝	完善驿站制度,设立长兴坊为中外商人提供便利		积极组织“官本船”贸易并鼓励民间海外贸易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整理。

四、古代关于运输的经济思想

商业的发展必须依靠交通促进,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成规模有赖于发达的陆路和海上交通网络。军事攻伐、民族融合、经济开发、对外交往、商旅贩卖甚至行僧云游等诸多因素都会促使道路网不断扩展,市场网依附于道路网,不仅将古代中国与亚洲、欧洲、非洲乃至美洲紧密联结,而且促使交通干线上人员往来密集、交换频繁的城市逐渐发展为国际商贸中心。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主要分为边境贸易和海上贸易两条支线,分别由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承担着这两条支线上古代国际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运输功能。汉唐及之前的朝代对外贸易以边境贸易为主,主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行;但晚唐以后,特别是两宋时期,在经济重心南移这一重大因素影响下,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日益成为对外交通、交流的主要通道,达致宋元海上贸易的极度繁荣。实际上,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是在陆海丝绸之路的开放实践中逐渐成熟化、系统化的。整体来看,陆海丝绸之路推动形成开放新格局,开放政策也逐渐趋于细致化和制度化。从陆上丝绸之路看,古代依托陆上丝绸之路促进向西开放兴起商贸中心,以吸引外商来华为目的的开放政策灵活多变;从海上丝绸之路看,古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代海上丝绸之路推动全球开放并促使更多外国商人迁移到中国,尤其以依托海上丝绸之路的市舶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开放型经济思想的具象表达。

(一)陆上丝绸之路:向西开放兴起商贸中心

受限于社会条件与运输成本,初始的经济交往在地理范围上极为有限,大部分产品的贸易起始于与邻近地区的边关贸易。两汉时期是中国大步走向世界的开端,对外贸易商路以陆路为主,沟通中外的陆上要道主要是陆上丝绸之路,从中国的西安(旧时首都长安)延伸到欧洲,四大段全长 7000 多公里,自汉朝起便是欧亚大陆交通的基本格局,于隋唐时期发展至鼎盛,成为商业活动、政治交流、文化互动的重要纽带。从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到东汉班超"平通汉道",再到各朝代利用丝绸之路发展同外国贸易交流吸引外商,不难看出古代有识之士对陆上丝绸之路的考量已从政治上孤立匈奴争取盟国,转向发展丝路贸易同西方各国进行经济往来,在认知上已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在陆上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过程中,各朝政府愈加善于运用这条通道发展国民经济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并推出了诸多促进丝绸之路贸易的措施与经济政策,主要是吸引各国商人"走进来"和促进中国商品"走出去"。其一,依托陆上丝绸之路进行招商活动,吸纳外商进入中国开展贸易。隋朝派重臣裴矩在张掖组织规模空前的国际交易大会(即史学家常提的丝绸之路上的"万国博览会"),引致并进行贸易往来的西域国家多达 44 国,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首创,也是现代"世界贸易博览会"的雏形,加强了隋唐与中亚、波斯(现伊朗)之间的经济联系。其二,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打造国际性贸易大都市。北魏政府将全国各地的丝织品集中到首都洛阳,"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吸引西域胡商前来贸易,将洛阳打造成全国最大的国际性贸易都会。其三,营造陆上丝绸之路上良好的营商环境以保障运输安全。隋朝政府在沿袭前朝设置军镇(鄯善镇和焉耆镇)、开展屯田活动等改善陆上丝绸之路长途贩运贸易艰辛状况的经济措施外,还采取多种措施鼓励西方商人来长安(古代首都)进行贸易,要求沿途各地要热情接待外国商贾,为其提供种种费用等。魏明帝时期也鼓励对外贸易,为防止地方豪强对胡商的敲诈欺侮,更是要求"吏民护送道路",并建立保障胡商交市和过境贸易的各项制度。

陆上交通运输通道上商品经济的活跃、人员的交流以及技术的传播成为推动地域经济发展最积极的因素,直接促进了沿线城镇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使得沿途一些原本落后的城市成为国际商贸中心,部分城市如敦煌开始初步发挥国际口岸的作用。发生巨大变化的区域首推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区河西走廊,该地区的武威、张掖、敦煌、酒泉等城市作为贸易中转站、商品集散地以及胡商聚集地,由政治军事重镇向经贸中心转变,拥有宽阔的商业区和繁多的商品种类。尤其是"华戎所交,一都会也"的敦煌成为陆上丝绸之路枢纽,胡商在此办理"过所"进入中原,各国商人在敦煌屯聚商品,"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除此之外,楚河流域(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境内河流)包括碎叶水城(今吉尔吉斯斯坦阿克贝欣城)在内的许多国外的城镇商业迅速发展起来,骤然成为陆上丝绸之路的交通孔道和欧亚大陆贸易的热点,是外国商人(粟特人等)进入中国的首站基地和贸易中心。

(二)海上丝绸之路:全球开放促进人员流动

魏晋南北朝时南方经济迅速发展,依托南方城市先进的航海、造船技术,古代海上贸易开始由近海走向远洋,交州(今越南境内)和广州等港口城市陆续成为商业中心,尤其到了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海洋贸易迅猛发展使得内外经济异常活跃,并推动海洋贸易政策不断走向开放化、专门化与系统化,是中国古代曲折开放的显性表达。相对陆运而言,海运无疑在运费和运量方面都是商人的首选。在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时期,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实质上形成了以中国商品为中心的国际贸易网络。一方面,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量相当可观,丝织品、茶叶与陶瓷制品等中国商品在全世界风靡。海上丝绸之路被世界各国人民称为"陶瓷之路""茶叶之路""香料之路"等,即反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映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史的若干时空片段和主要流通的大宗经贸商品。另一方面,中国的贸易伙伴遍布亚洲、欧洲以及非洲,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以及内陆大都市都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的交接点。

依托海上运输通道,除了可观的国际货物贸易规模,各国之间人员流动也相当频繁。一方面,强大的中国吸引各国派遣使者来中国访学,停留时间最长可达几十年。日本遣唐使团成员规模较为庞大,一般为500人左右,通常从最通晓经史、擅长书墨或精通唐朝情况的人才中选拔,包括造舶都匠、工程师、阴阳师、画师、学问僧、学生等。宋代明确见于史书记载的高丽官派留学生仅有11人,但从高丽留学生在宋学习和及第的表现看,这些学生水平颇为不错,都是高丽青年学子中的优等生。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外国商人沿海上丝绸之路乔迁中国,在中国学习和经营国际贸易。唐宋时期在京城以及各市舶口岸都居住着许多外国商人及其眷属,广州蕃场最盛之时约有13万外国人。各外贸港口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成立"蕃坊"供外国人居住,提供"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成为当时海外贸易发达的佐证。

与海外贸易发展相适应的是海外贸易政策,由市舶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可窥见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的演变。唐宋时期积极鼓励的海上贸易政策标志着中国古代对外开放规模逐渐扩大,尽管在明代发生转折开始了有限度的开放,但不可否认的是,唐宋时期的政策性经济思想是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的重要里程碑。唐朝政府于玄宗开元二年(714)在当时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广州设立了海外贸易的主管官员——市舶使,管理外商在华贸易,这标志着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市舶制度的诞生。宋代是中国古代对外开放的黄金时期,出台了完备的贸易管理法规《市舶条法》①,设立了专门机构市舶司负责海外贸易管理和征税,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海外贸易发展的措施,这一切极大地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元代出台的《市舶则法》则形成了系统化、文字化的管理海外贸易的规章,进一步精进了市舶司的职能。

(三)陆海运输安全:官方与民间解决方案

与古代陆海丝绸之路上呈现的繁荣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丝绸之路上恶劣的贸易条件和环境,部分路段时断时续,运输安全形势严峻。运输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当时的自然地理环境、交通运输方式以及生产力水平较低导致的运输难题。陆上丝绸之路经过戈壁沙漠和崇山峻岭,自然条件恶劣行程艰难,贸易只能靠运载量有限且速度很慢的驼队运输,在交通信息落后、安全系数较低的古代困难重重。造成海上丝绸之路艰难的客观原因在于航海技术较为初级,宋朝时常有"船久不至"的现象。二是古代中国以及沿线国家、地区政治安全问题对国际贸易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如汉代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西域路段人少国多常有战乱,后汉时期王莽篡权,丝绸之路上演"三通三绝"。宋代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安全部分归因于政府管理部门贪赃枉法。三是海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萌芽较早。在茶叶风靡欧洲时,欧洲国家对中国茶叶的税收达到了200%,以保护本土茶叶产业②。

鉴于此,古代政府也探索了多种方案维护国际贸易运输安全、优化营商环境以促进贸易便利化,主要可以归为自上而下的官方解决渠道和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解决方式两类,前者占据主要部分。从官方解决渠道来看,一方面,自汉朝始建立西域都护府或其他军事、行政管理机构,设置军镇以改善沿线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解决部分地区地广人稀产能低下难以满足来往商旅需要的问题。元朝制定的驿站制度在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交通运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驿站以服务军事活动为开端,逐步扩展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具体功能是给来往官员、朝贡使者等提供食宿和交通工具,以及作为信息

①夏秀瑞、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②[美]康拉德·希诺考尔、米兰达·布朗:《中国文明史》,袁德良译,群言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页。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传输、物资运输和补给、资金交换、官方贸易的枢纽。据《元史》所载,全国总计驿站数约 1400 处,包括陆站、水站、步站、马站等。另一方面,加强对外贸易法治建设。如前所述,设立互市监和市舶机构分别掌管边境贸易和海上贸易,并逐渐形成和发展了成熟的古代海外贸易制度体系。从民间解决方式看,私人经营的旅馆、客舍应时而兴,接待来往行人、商贩。盛唐开元天宝时期,我国中原地带交通运输畅达,旅馆业勃兴,旅店当时称呼颇多,有客舍、旅舍、旅馆、邸店、村店等。

五、古代关于治理的经济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便深入论证过“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对于理想世界秩序的构建和倡议有诸多成熟经验与思想理论,以“义利观”“天下观”为主要代表的治理思想不仅指导着古代开放市场中生产、运输与交换的全部过程,也影响着中国看待世界的观念以及与世界交互的中国方案。15 世纪的航海大发现后西方才逐渐走向世界,推广“以力服人”的西方近代文明外交价值观,与“以理服人”的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解开中西走向不同道路之谜的关键所在。“义为利先”的经济伦理与“天下为公”的经济构想等中国古代文明关于治理的经济思想,隐含在古代思想家对于世界规律与社会哲学的讨论和探索中,因此多属于经济哲学思想。这一开放型经济思想指导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以和平互利的儒商式“商业精神”担负起“懋迁有无”和“调剂盈亏”的社会职责,这是以竞争与利益为出发点的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缺少的政治经济思想,也是导致后者在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问题时明显无力的关键。

(一)义利观思想:义利并举与义为利先

义利观思想是中国古代经济社会中形成的义为利先的经济伦理,起源于对人性本利与资源约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争辩,并被应用在国际贸易与国家利益、国家关系的经济事务中,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学派、司马迁、朱熹等引领了关于义利观的哲学大辩论,主要的辩论方向是“利是不是正当的”,其次引申出了“先义后利”还是“义由利生”,即“道义”引导“利益”,还是以“利益”统摄“道义”的问题。最终儒家思想所提倡的“重义轻利、义能生利”思想成为历朝历代的官方意识形态,认为发展经济以富国富民是礼义的本意,道德在市场经济中起着方向性的作用,并将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作为国际贸易与国际交往中应该遵循的重要规则。具体来说,正确的义利观主要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从个人角度看,义利观阐述了中国人民从古至今对于物质和道义、做人与经商的终极追求。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家们认为对利的追求引起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竞争和商业可能导致经济严重背离社会伦常秩序,造成社会动乱,通过提倡“见利思义”“克己复礼”的约束观,希望凭借“礼”即制度建设来凝聚人心,以此调解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从国家关系角度看,义利观体现了古代中国在重视国际贸易利益的基础上处理内政外交的伦理准则,对国家的治理、国际关系的把握具有关键的导向作用。《孟子·告子下》中“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认为国家间交往如果只看彼此眼前的利益,则关系必然不能长久且易引致祸患。如东周时期周襄王借外族(狄族)兵攻打兄弟国郑国最终被狄族侵害,此举既不符合道德也不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即“义利皆失”,体现了义为利之本的国际经贸关系实质。可见,在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中,如何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处理国家之间的经贸利益关系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二)天下观思想:天下大同与天下同利

天下观思想涵盖了古人关于世界规则、大国关系的认知和对外部世界结构与秩序的构想,论述了中国封建王朝在华夷关系网络中乐于向外输出中国文化,以“天下为公”为政治目标的大国角色与世界主义观念。“天下大同”与“天下同利”是天下观的核心思想。“天下大同”思想由墨子提出,他根据尧舜传说设计出大同世界的场景,在其中不分亲疏贫富、没有祸乱讨伐,人们平等互利、合作共赢,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这种“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世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超前设想。“天下同利”的思想来源于管仲的治国思想,他提出“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就可以“结诸侯之亲”,指出了国家占有财富而后正确运用与世界各国共享的实质。古代思想家们具备超前的“忧天下”的责任意识,同时也提出了实现“天下大同、天下同利”的具体路径,主要包含两个层次的要求。其一是对内的要求,在鼓励商业活动的基础上强调经济效率和公平的平衡,主张政府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证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保障人民免受不公正的负担和利益冲突的侵害。其二是对外的要求,古代中国面对形成对抗关系的其他国家能够平等视之,通过盟约的方式与列国消除对抗换取和平,实现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和平发展。

六、现实借鉴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早已有之,在社会与经济变迁中逐步完善,是古人对古代生产、交换、运输与治理问题的探索,包含了现代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较后者早了数百甚至上千年。尽管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中存在一些传统经济思想的教条,从现代视角来看某些观点和理论可能狭窄与浅显,对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与经济问题的解释与指导力有不逮,但其中的开放因子与带有规律性的经济学理念和分析,至今仍具有现实借鉴价值。全面、系统地研究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阐述它的基本思想、发展程度、发展阶段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古代经济社会制度的认识,而且将这些清晰的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深刻命题的具体化,对当前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生产和交换的启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将有限的社会资源用于“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的问题是古代经济社会的首要问题,交换部分解决了资源约束的困境,而“交换什么,在哪交换”进而衍生出“如何开放”的问题,成为古代政府长期探索的命题。历史事实表明,经济开放的朝代大多是商品经济发达、生产力极大进步的强盛王朝,尤其是汉唐以后边境与海外贸易繁荣,古代社会实际上形成了以“国内生产+世界市场”的大国经贸体系,开放型经济也逐渐形成。可见,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是由内循环向外循环发展的过程,内循环的成功拉动了外循环,然后外循环助力内循环形成螺旋上升的激励机制。其重要特征是彼时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处于世界前列,中国对外国商品的需求较少,而外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较大。这进一步为现代社会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经验指引和理论基础。

第一,妥善处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市场经济与政府监管的平衡在中国古代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实践经验,关于交换的经济思想中的“负面清单管理措施”“战略资源国有经营”“发展内生动力”“轻重术”等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为现代经济起到了劈山开路的作用。一方面,要重视政府力量维护市场秩序,政府参与重要物资的供给和调节,对关系国家安全、战略发展的重要行业、产业发挥引导作用,规范进出口活动,谨防重要战略资源外泄;另一方面,要重视激发国内市场效能,发展内生动力扩大国内消费,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激活社会活力、拓展消费和投资,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通过畅通“消费”子循环,推动国内大循环高质量发展。

第二,妥善处理国内经济发展与国际市场开放的关系。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中早已阐述了“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的经济思想,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是国际市场交换的重要功能。世界市场是配置资源优化生产的重要场域,市场开放不应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对立面。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在正视、利用和发挥世界市场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注意国内经济发展问题,调整国内、国外生产消费关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系,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容量,通过生产环节提升国内供给体系对国内外需求的适配性,通过深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与专业性,通过畅通“生产”子循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

(二)运输的启示:共建“一带一路”

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经济外循环的重要通道,是连接生产与交换的关键部分。影响古代丝绸之路繁荣的关键因素并非简单的商品价格、供求关系或者运输成本等问题,而是主要取决于丝绸之路上的营商环境、沿线国家的政权稳定、双边国家政治关系与秩序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古代社会解决以上问题优化陆海丝绸之路营商环境的重要方案在现代社会也不过时,对21世纪“一带一路”倡议的畅通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一,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贸易营商“硬”环境。古人曾在陆海丝绸之路上设立军事行政管理机构等为陆海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保驾护航。当前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也需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交通、通信、水利和电力等基础设施方面的互联互通,完善沿线的运输服务、货物安全保障与信息共享,极大促进贸易便利化,这是“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重要基础,也是一个全方位、复杂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第二,深化“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伙伴友好合作协议,优化贸易营商“软”环境。古代政府与各国签订的通商条约以及陆海丝绸之路上灵活积极的开放政策对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方面,我们应与沿线各国建立长期友好合作关系,订立较为完善的双边与区域合作条款,共建贸易协商通道规避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了经验与机遇,不仅要将中国优势产业推广出去,也要帮助沿线各国找准自己的定位,有针对性地参与其中,科学规划本区域的产业。

(三)治理的启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古代对外开放过程中,中国更关注国际贸易中“义为利先”的政治性和“天下一家”秩序的构建,将商业利益置于次要的地位,这与将商业利益与霸权地位作为首要目标的西方国家明显不同。可见,中国古人先于全球化浪潮千年,就已经以大国政治经济模式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观,而这一思想到今天仍然具有非常现实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大国地位较古代发生明显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交往中的霸权主义、保护主义、强权政治依然活跃,不仅损害了国际贸易秩序,也使得贸易双方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据此我们应大力推广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以“义利并举、义为利先”和“天下大同、天下同利”的价值观引导对公平贸易的追求。中国政府应积极弘扬中国古代文明开放型经济思想中的正确义利观和天下观,将其纳入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

(责任编辑:张婧)

(C)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